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1945-1976)》(上、下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797頁。

毛升*

長期以來，史學界關於北韓只有零星的研究，主要原因在於史料難以獲得。1970至1980年代英語學界出版的成果，¹主要利用的是西方國家的外交檔案以及情報、日本秘密警察在殖民時代搜集的朝鮮共產黨的情報及審訊口供，還有對當事人做的訪談。最重要的材料，則是1977年解密的1950年美軍在朝鮮戰場上繳獲的檔案，名為《美軍在朝鮮繳獲之紀錄》(Records Seized by the US Military Forces in Korea)，現保存於馬里蘭州的美國國家檔案館。該檔案達160多萬頁，主要為韓文，其中包括金日成早期講話的手冊、報紙、雜誌、各種組織的會議紀錄、朝鮮勞動黨的文件、政府文件、書信、日記、照片、個人檔案、法庭紀錄等。這些史料對了解1945年至1950年間的北韓歷史有很高的價值。²19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學界開始大量利用社會主義陣營的解密檔案，目前最方便利用的就是蘇聯、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家的檔案。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

¹ Robert A. Scalapino and Chong-Sik Lee, *Communism in Kor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2 vols.;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² Dae-Sook Suh, "Records Seized by U. S. Military Forces in Korea, 1921-1952," *Korean Studies*, Vol. 2 (1978), pp. 177-182.

然這些檔案所呈現的是社會主義盟國的視角，卻極大地填補了北韓自身檔案不開放所造成的空白，提供學者「從外往裡看」的機會。從史料的角度來看，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專家沈志華教授《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以下簡稱《中朝關係》）一書的亮點，則在於作者費十年之功蒐集大量的中文檔案，許多檔案為第一次披露，從中國材料去解讀冷戰時期北韓與其社會主義盟國，尤其是中國和蘇聯的外交關係。

《中朝關係》的〈序篇〉介紹了中朝共產黨人的早期關係。朝鮮半島在日本統治期間，朝鮮共產黨將活動重心轉移到中國東北，並完全融入了中共。二次大戰後，金日成的「游擊隊派」被蘇聯看中而成為當權派，與蘇共接近，而與中共漸行漸遠。中朝關係始終籠罩在中蘇關係的影響之下。

本書第一章討論的是二戰結束北韓被蘇聯佔領到中共奪得國家政權前，中朝的黨際互動。當時中朝兩黨其實並不親熱，只是因為蘇俄的對華政策而發生聯繫。中共奪取政權後，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被史達林委以承擔領導亞洲革命的重任，但北韓對中共的亞洲領導權並不以為然，雙方的關係「若即若離」。

接下去三章是勾勒從1950年韓戰爆發到1960年中蘇分歧進一步擴大的十年中朝關係的變化。戰爭期間，中朝表面親密，但在戰爭目標和作戰方式上衝突迭起。中國出兵後加強了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但金日成卻擔心北韓的獨立性受到威脅，對中國的軍事存在憂心忡忡。1956年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化」運動在共產世界引起連鎖反應，北韓的一些黨員挑戰金日成的個人崇拜，結果被打成「反黨集團」，出逃中國，即著名的「八月事件」。中蘇都試圖對「八月事件」加以干涉，迫使金日成承認錯誤，中朝關係也因此陷入危機。1957年，毛澤東國際威望上升，試圖與蘇共平起平坐。毛為爭取更多的支持者，向金日成承認干涉之誤，並答應全部撤回在北韓的志願軍，中朝關係才得以緩和。

中蘇矛盾出現，北韓如何在夾縫之間生存？這是第五章的討論重點。金日成利用雙方都試圖拉攏北韓的機會，實行等距離外交，兩頭獲利。中國為了籠

絡金日成，即使國內出現「大饑荒」，仍向北韓提供了大量糧食。在處理韓國僑民、東北朝鮮族邊民越邊事件時，中共往往依從北韓的主張，甚至把長白山天池大部劃給了北韓。

文革開始後，中共實行激進的外交路線，北韓發表系列批評文章影射中共。因此，造反派也視朝鮮勞動黨為「修正主義」而加以批判，還在中朝邊界製造了一系列糾紛，令金日成不滿，北韓因此迅速倒向蘇俄，開始反華。1968年後因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北韓需要中國的支持，主動提出和解願望，中朝才又恢復「兄弟」之情。1970年後，中美開始破冰之旅，毛澤東逐漸放棄世界革命目標，於是北韓開始全面宣傳「主體」思想，繼續扛起世界革命大旗。中美關係的緩和，在外交和地緣政治上動搖了中朝「特殊關係」的基礎，兩國之間已經「貌合神離」。這是第六章的內容。

〈餘論〉認為在毛澤東時代，中朝之間的外交以黨際關係取代了國家關係。同時，中共仍延續宗藩觀念，將北韓當成一個緩衝地區，為此不惜勒緊褲腰帶加以援助。此一做法使得金氏獲利巨大，而中國則背上了沈重的包袱。沈志華建議，只有基於國家利益的外交，才是正常的現代國家外交關係，而中國處理當下朝鮮危機的出發點，應該是中國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

英文學界關於北韓研究所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北韓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其研究範式深受蘇聯史研究，尤其是被視為最專制、殘暴的史達林統治時期，即所謂「史達林主義」（Stalinism）研究的影響。「極權主義學派」認為，北韓政權只是模仿史達林的統治模式，故極其殘暴。³然而，同樣是蘇軍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何以東歐實行的是賦予基層社會相對多一點自由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⁴北韓卻是世襲的領袖專政？更重要的

³ Robert A. Scalapino and Chong-Sik Lee, *Communism in Korea*, 2 vols.;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Adrian Buzo, *The Guerilla Dynasty: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in North Korea*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1999);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C. Hurst & Co. Ltd., 2002).

⁴ Croey Ross, *Constructing Socialism at The Grass-Roo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Germany, 1945-6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 9.

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已灰飛煙滅，但北韓仍然存在，似乎也沒有馬上崩潰的跡象，這些都是蘇聯因素所無法解釋的。後來的「修正主義學派」則強調北韓制度的本土因素，如比中國儒家傳統更嚴苛的朝鮮儒家文化以及日本殖民經歷。部分學者甚至認為，本土的因素從蘇聯一佔領北韓即開始，只是爲了獲得蘇聯的援助，沒有表現出來而已。⁵2013年 Charles K. Armstrong 出版了討論北韓外交關係的專著 *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不再將北韓看成是國際外交舞台上一個任人宰割的小卒，而是以其爲中心考察小國如何牽動大國政治。該書指出冷戰史不只是美蘇爭霸史，小國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⁶雖然北韓從 1992 年開始的核子彈威脅，不斷強化外界視北韓爲「流氓國家」的形象，但西方學界的研究趨勢卻是逐漸走出歐美中心，將北韓視爲一個「正常國家」，試圖去理解它。⁷而中國正好相反，中朝關係的複雜歷史從韓戰以來就被美化、簡化爲「血濃於水」和「唇齒相依」。因此，《中朝關係》一書想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把「血濃於水」的迷思放回歷史語境中，告訴中文讀者，概括中朝關係更合適的詞彙倒是「冷暖無常」。從打破迷思，提供讀者一個更接近歷史事實的中朝關係來說，本書做得相當出色。

《中朝關係》引導我們去探究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尤其是中朝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外交關係？沈志華認爲毛澤東雖爲革命者，但仍有帝王思想，視北韓爲藩屬國，這也就是爲什麼作者將中朝關係稱爲「天朝」的原因。中共雖然是革命黨，其外交政策卻無法擺脫傳統的影響，但 1949 年後的中朝關係符合宗藩關係的定義嗎？張啓雄指出，中國和周邊王國間的「階層體制」（hierarchical system）其實包含複雜的要素，⁸但本書使用宗藩關係的概念，主要是強調北

⁵ Bruce Cumings, *North Korea: Another Count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⁶ Charles K. Armstrong, *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 1950-199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⁷ Sonia Ryang, ed., *North Korea: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Charles K. Armstrong, "Trends in the Study of North Kor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May 2011), pp. 357-371.

⁸ 張啓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收入吳志攀等

京希望平壤「追隨」自己，在中國的影響之下。其實，這種試圖對他國保有影響力、甚至緩衝地帶的做法並非中國獨有。Zubok 與 Pleshakov 就指出，蘇聯基於歷史上拯救歐洲於「蒙古之軛」（The Mongol Yoke）、拿破崙入侵、納粹德國的佔領所產生的彌賽亞情節，與馬克思主義理念的結合，深刻地塑造了冷戰時代蘇俄的外交觀，使得蘇聯共產黨當仁不讓地將自己看成是世界的拯救者，並將在全世界擴張共產主義視為理所當然。⁹而「新冷戰史學派」的代表人物 Gaddis 則認為蘇俄和美國在二戰之後都成為了帝國，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滲透、控制，並利用各種手段來維持盟國對自己的依賴度（credibility）。¹⁰再者，北韓在 1970 年代也曾經慷慨地對非洲一些剛獨立的國家進行經濟援助，以擴張其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以上這些相似性，無疑地都使如何定義中朝關係變得更加複雜。中國在朝鮮半島的作為，究竟是一種現代現象、冷戰現象、社會主義現象，還是歷史上「天朝」意識的復原？似應作更深入的探討。

這又引出了另外一個議題，即如何定義「國家利益」？為了獲得北韓的「跟隨」，中共多年來進行經濟、軍事援助。由於本書完全從物質方面定義「國家利益」，而北韓的「跟隨」無法用物質來衡量，因此作者認為這種交換是虧本買賣，損失了中國的利益。Gaddis 則認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學派」對利益的定義過於狹窄，利益不只是物質，也應包括「理念」（idea），¹¹畢竟冷戰不只是軍事、經濟之爭，更是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之爭。兩個陣營之間在較量，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亦有爭鋒，蘇、中、朝都在輸出自己的革命理念與模式，爭奪追隨者。因此，中朝之間的互動，不應該只算經濟帳，也要把「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考慮進去。比如，在中蘇出現分歧之後，北韓選擇「跟從」哪個國家，就意味著誰的社會主義道路「得道多助」。這種支持雖不同於經濟、

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5-146。

⁹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

¹⁰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4-285.

¹¹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 282.

軍事援助，對中蘇的意識形態之爭卻影響極大。

儘管本書的中國中心視角有時影響了作者同情地理解北韓在大國關係中的艱難處境，中朝之間說分就分，要合即合的論述似乎也過於戲劇化，但本書仍是中文學界迄今最重要的現代中朝關係史著作，值得一讀。